

人物档案

地域文化探源

绿色里的身影

——怀念我的父亲解礼尚

解剑冲

在那个阴影笼罩、疫情甚紧的春天，我们还是没能留住父亲，这一天是2023年2月18日。我想，走过辛勤耕耘、一生守护绿色的父亲，他是真的累了。

父亲走时，山里的绿树刚伸出新芽，湖边的杨柳垂着枝头似乎在诉说着大山里“绿色身影”的故事。父亲的很多同事、朋友纷纷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哀悼和怀念，让我感动，也让我对父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父亲早年在观城钢铁厂做过炉工，在下窑舍窑厂干过窑工。上世纪60年代回乡务农，从山林队的护林员做起，担任过生产小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等。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怀着心中的那一抹“绿”，爬遍了五磊、双峰的山山弯弯，踏遍了大岙、小岙的溪溪坑坑，带领社员们筑山塘、垒堰坝、挖水库；开垦瘠地造田、荒山育林，扩种杨梅、茶叶、毛竹等经济林。在造“走资派”反的那个年代，父亲一度“靠边站”，远离村庄，去前房岙、庵弯岗的深山里守护这片山林孤岛。就是这个经历，使他成为社员们口中的山林“活地图”和林技“土专家”。

1974年，父亲被抽调到明湖公社从事林业专管工作。在之后的20多年间，他一直在宓家埭乡和鸣鹤镇工作，专注他的“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梦想。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他的办公室里总有一大叠蓝色的林区分布图和一堆摆得整整齐齐的护林笔记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图表数据，例如什么季节、什么山头容易发生山林火灾，什么林区应开辟防火道，什么针叶林、针阔混交林会发生病虫害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父亲担任乡（镇）农技站、林特站负责人时，经常能脱稿说出大量统计数字；抓一把泥土捻一捻，就可说出土壤的种类似和性能；指向一种树木，就能随口讲出其生物学特征和栽培管理办法。镇里的领导和林业部门的专家对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清晰的工作思路印象深刻。我想，父亲身上的这些特点，和他的林业技师背景不无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种植地段）后，在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父亲认为林地承包到户后，应掀起荒山造林行动。为此，父亲在镇领导的支持下，在杜岙村租用了一块荒山，进行育苗造林试验。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地说：“这块荒山是生地，石块多，怎么能育苗成林呢？”现在的人可能没法理解那时基层干部的朴素想法。几年后，昔日杂草丛生、乱石遍地的荒山秃岭，形成了一道绿色屏障，变得郁郁葱葱。父亲的荒山育苗造林试验成功，引得广大山区农民纷纷效仿，一些闲置的荒山陡坡、深沟谷谷都披上了新绿，父亲也因此被评为县先进生产工作者和绿化先进个人。

父亲不仅投入到改造荒山、植树造林的事业中，还想方设法推动山区林特经济。1987年春，他将几株野生雷竹移植到东山的荒坡上，进行“雷竹笋速

生试验”。第二年，坡地上冒出200多株金灿灿的小雷竹笋，宓家埭乡领导和老区经济开发办的专家实地考察了雷竹笋速生试验情况，认为种植雷竹笋有“钱途”，能带动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就让父亲和他的林技员们进行“雷竹笋密植速生高产试验”“丰产素雷竹高产试验”。1989年，黄牛岭上一块小小的雷竹园，形成一大片竹林，当年的雷竹笋收入达到6000余元。同年，速生高产和小阳春出笋试验通过省、市林科部门鉴定，《宁波日报》《浙江科技报》《农村经济信息报》相继报道了“解礼尚小阳春雷竹笋高产试验成功”的消息。

在探索雷竹笋高产栽培技术、配方施肥技术和鲜笋保鲜技术的10余年间，父亲摸索出一套雷竹笋“一年种、二年养、三年见效益、四年达高产”的管理方法，成为远近闻名的“雷竹大王”。

随着雷竹笋种植经验的不断积累，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积极举办雷竹笋栽培管理技术培训班，开展雷竹笋病虫害防治科普讲座，为竹农印发技术资料，组织他们到试验基地参观，并免费提供种苗。省林科所和市农经委的一些专家、领导非常赞同这种“农家讲堂”，特地送来一批竹、笋培育技术手册和图书。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鸣鹤、宓家埭、东埠头一带的荒山、低岭、深岙和村前屋后广种雷竹，使雷竹笋特色产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其中“鸣鹤雷笋”“杜岙雷笋”被评为市优质农产品，成为慈溪文化集萃《慈溪百品》上的林产名品之一。父亲以带动山区农民在家创业致富的林技工作者身份被评为市劳动模范。

父亲在家中话不多，在子女教育上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但那句“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做出一点成绩来”的话却常讲。事实上，他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当我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一点成绩，也被评为市劳动模范时，父亲只说了一句：“父子都是劳模，好啊！”那一天他笑得很灿烂。

退休后，不忘初心的父亲没有放慢植绿、护绿的脚步，仍坚持每天爬山头，把各个山岙、林区的地形、走向、岙底沟谷和重点防火区域分类记录，供接班的人参考。有一段时间，他跟着梅农们学杨梅树嫁接，研究“杨梅树霉根防治”“杨梅树白蚁灭杀技术”等课题，其中“竹笋两用林白蚁防治技术”“雷竹笋速生高产技术”等成果还获得宁波市科技进步奖和绿色丰收奖。父亲还在雷竹园混种哺鸡竹，在竹林下套种蔬菜。也许，在父亲内心深处，他永远是山林里那个忙碌的“绿色守护人”。

2016年9月，父亲因突发脑梗住院，在跟病魔抗争的岁月里，仍不忘他心中那片“绿”，杨梅树矮化锯了么？竹林可以施肥了……我想，包括父亲在内，他们那一代人，已经把心血洒在这片土地上，把生命融进这个时代里。思亲惜尽情无尽，念父音归人未归；想父音客空有泪，欲闻教训杳无声。父亲，在茫茫大山绿色里的身影，就像一片叶子，当果实成熟的时候，静静飘落。

我想说：父亲如有来世，我还愿意做您的好儿子。

古时以北为阴，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诗·公刘》云：“即景乃冈，相其阴阳。”早在原始社会，中国先民即按坐北朝南的方向修建村落房屋，以顺应天道，得山川之气，受日月之光。历代皇陵也都以“坐北朝南”为方向，惟秦始皇陵“坐西向东”，何故？说是为了盼望东渡未归的徐福。

当年秦始皇命方士徐福携“百事之工”、资以五谷种种及数千名童男童女浮海东渡，据说是为了去海上三神山求长生不老之药，然徐福一去不返，从此成为千古之谜。这里便有几个问题：其一，秦始皇真是出于这个动机吗？我的看法是：难说！且看他首次巡海所立的碑文：“古之五帝三王，知数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这是迷信神鬼的口吻吗？他自称“始皇”，大修墓地，即可看出他也不知命，并不真信长生不老之事。那为何劳师动众外派徐福呢？我想多半出于养生、长寿的考虑吧。以为世上真有这么一种延年益寿的仙

草。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出于“以示强威，服海内”的壮志雄心使然，令徐福寻药的同时，彰显一下恩泽四海的气度。其二，徐福为何一去不返？这有很多种猜测和分析，我认为避祸不归恐为合理推断。公元212年，咸阳城内有400余名儒生、方士被杀，史称“坑儒”。虽有政治原因，却也与方士们长期寻药无果、秦始皇觉得受了愚弄，遂以“妖言以乱黔首”之罪杀人泄恨有关。徐福也受到警告，“徐市（即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措辞不可谓不严厉，胆小的自然不寒而栗，事实上有不少方士如卢生等早被吓得开溜了。徐福是个聪明人，虽苟全性命于一时，然心理上却不可能没有盘算。他很沉得住气，直到两年后才编了一套说辞，蒙住了秦始皇，这才靡费周张，供其出海，酿成史上最华丽的金蝉脱壳之计。

那么，带着3000童男童女及“百事之工”出海未归的徐福，究竟去了哪里？是否如传说中的去了日本？至今尚无定论。但对于徐福的记载和研究，自西汉迄今已2000多年，究其源头，当属太史

公的《史记》。在《史记》的《纪》《传》《书》中，太史公反复提到徐福率众东渡的时间、地点、人员、物储、困难、往返等，最重点的一句话即“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很多学者认为“语焉不详”“扑朔恍惚”，没有交代清楚是否去了日本。能苛求太史公吗？西汉尚无“日本”这个国名，你让他如何标注“平原广泽”就是日本呢？除《史记》外，这方面较有分量的记载还包括南朝范晔的《后汉书》、晋代陈寿的《三国志》、五代后周义楚的《义楚六帖》和北宋欧阳修的《日本刀歌》等，与《史记》的记载大同小异，糅合了一些神话和文学色彩，未免有近诞离奇之嫌。但无论是陈寿提到的“夷洲亶洲”、范晔提到的“东夷”，还是僧人义楚提到的“倭国”和欧阳修提到的“传闻其国居大岛”等，都令后人更倾向于“徐福是去了日本”这一观点。到了清代，随着负笈东瀛的学者渐多，比如黄遵宪、薛福成等人皆持徐福去了日本这一立场。

历代有些日本学者包括当代若干中国学者，甚至认为徐福乃日本神武天皇，即日本的“始皇”。有

徐福的“不归路”

喻 军

定。手机上网一搜，这次在《翁的研究》网站“翁姓历代进士名录”中发现翁熹信息：“翁熹，浙江钱塘，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甲38名”书架上拿出《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一查，果然在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1890年）吴鲁榜见到三甲第三十八名进士翁熹的名字，不过“熹”字铅字有残，比较模糊，看来是以前查找工作不够仔细啊！奇怪的是，同榜慈溪还中了三位进士，是二甲三十七名进士杨家骥、二甲第一百二十九名进士陈康瑞和三甲第二十八名进士葛祥康，此三人在光绪《慈溪县志》卷二十一“选举下”都有记载，唯独缺了翁熹。此后慈溪县还有林颐山和裴鸿勋助中光绪十八年壬辰科刘福桃榜进士，而杨家骥、陈康瑞、葛祥康、林颐山、裴鸿勋此五人今皆已不属于慈溪现境，翁熹可算是慈北最后一位进士了。

翻看《清代硃卷集成》《浙江省人物志》《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都无翁熹信息。又查宁波数字图书馆，有一段词条：翁熹，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人，清朝政治人物、同进士出身。光绪十六年（1890年），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登进士三甲38名。同年五月，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

网上零零散散搜到一些资料，《崇文书院课艺十集》中介绍：“翁熹，字又鲁，号亦衡，慈溪人，钱塘籍。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十六年（1890年）进士。官绍兴府教授。”于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上下二册，其中《崇文书院课艺十集》上记载，“光绪甲午（1894年）十月开雕”“掌教翁又鲁先生鉴定，临院许承授、姚已元编校”。除翁熹的简介外，还有他写的一段序：

“【略】盖所崇者文，而所以崇文者，文以载道也。今虽中外道通，世局日异，文亦浸衰矣。然时有古今，道无古今，士诚守千古不变之理法，所以挽时局者，亦未始不在此。

熹不文，承前中丞崧公、今大中丞廖公先后委主崇文讲席，以才疏学浅，辞不获命。今夏授职越中，始谢去。又适当崇文十刻之期，熹何人斯，敢膺选政？职无可授，勉随将事。浙中人文渊海，扬芬摘蕊，美不胜收。沧海遗珠，自知不免。惟区中微意，务期骋才气者不泥理法，读经世之书，务反身之学。庶几文行交修，处为名儒，出为名臣，以无负各大吏崇尚文教之意，而不过为世俗所轻。是所厚望于诸君子。

光绪乙未（1895年）孟冬之月，钱塘翁熹谨撰。

《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页下标注有翁熹资料的出处：光绪《慈溪县志》卷21《选举下》，第462页；民国《杭州府志》卷113《选举考》，第2199页；《民国杭州市新志稿专辑》卷26《人物》，第292页。于是又购得《杭州地方志资料》第一、二辑，此为《民国杭州市新志稿》专辑，但里面介绍与上面一样，比较简略。再购《绍兴县教育志》，无翁熹信息。

网上还有翁熹为民国《上虞崧镇严氏家乘》所作《序》，其中有句载：“岁甲午日东兵事起，仆适掌教崇文……皇帝龙飞建元之岁仲春二月，兼摄虞山学录，自夏历秋，适越梓修筑，唯两地往还焉。”还有《枯木禅琴谱》翁熹的诗记：“己丑庚寅寓京，仁和阮端之大令达元精琴律，都中推第一，山东三寺琴师王君心源折服焉。”

再是翁熹的题字，绍兴鲁迅纪念馆西北侧朱家台门“老磐庐”，有明代重臣朱熹故物磐石一座，绍兴府教授翁熹曾拜谒此石，并刻有“金廷相公故物，翁熹拜题”等字样。

综合上面这些资料，可见翁熹博学多才，善诗文，通音律，能书法，在文化教育界声望较高。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后并未授职知县，而是被两位浙江巡抚崧公（叶赫松駿）和廖公（廖寿丰）先后委任主掌崇文书院。崇文书院为杭州四大书院之一，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南巡，题榜“崇文”，遂更名为“崇文书院”。光绪年间，海宁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在此读书。此前掌教马传煦为咸丰九年（1859年）会元，二甲第24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主掌戴山、龙山、崇文书院，先后三十余年。叶赫松駿任职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八月至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廖寿丰任职在光绪十九年十二月至光绪二十五年正月，翁熹主掌崇文书院应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八月后，1894年甲午之战时还在掌教崇文书院，1895年夏方任绍兴府学教授，成为绍兴府最高教育长官。知县为正七品，绍兴府教授也是正七品，品级相同。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兼理上虞县学，在绍兴、上虞两地来回奔波，而民国后再无信息。

去周家段查看进士门头，大屋早已改造得面目全非，只能依稀看出原来四合院式的模样。新建的屋边有几块残破的石构件，好像是牌坊或是门头上的。东北角的两间厢楼还在，但房顶已穿，楼板已塌，整个楼房摇摇欲坠。询问了周边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不知进士的名讳，只说那两间破房子的主人在上海，不是后代也不得而知。

再一次细细翻看《翁氏家乘》，周家团翁氏在明末清初时迁自鹤皋翁山（鸣鹤翁家岙），始迁祖为五十六世翁岳，至清咸丰九年（1859年）翁珠纂修《翁氏家乘（周家团支派）》时，200年间据称已繁衍发展有800余家，字辈排行“岳衍行乾坎艮震巽丰益济齐圣广渊明”，已至16世。家谱中不见翁熹之名，私下猜测有两种可能：一是此谱纂修时翁熹尚未出生；二是其出生于钱塘（杭州），父祖辈时已迁杭州，因信息不通，名字没有入谱。查谱中迁居杭州者有6户，为六十三世巽二十二翁仁辅（生一子），六十四世丰六翁九卿（生三子锡荣、观福、东相）、丰廿六翁子发（生二子）、丰廿九乳名财，六十五世益九（生有二子），六十六世翁兆英，翁熹或许就出自这几家。

花费了两个多月时间和500多元购书费用查找进士翁熹，至此已

人经考证发现，在日本的开国神话特别是关于神武天皇东征的记载中，竟有37处与徐福的经历侔同。有学者宣称在日本经过实地探访，找到徐福遗迹共56处，还考证出神武天皇的父亲和徐福父亲同名；其祖父与徐福故乡琅邪郡（现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所祀四时主神相符等。他们据此认为，正是徐福大的船队所载负的丰富物资及登岸后的文化传播，才改变了当时的蛮荒之地日本，与原住民共同奠基了最初的文明形态。日本曾有个华裔首相叫羽田孜，自称为徐福的后代。他经常参拜徐福祠堂，任内积极促进中日间的来往。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这是明治维新前日本汉学家在“崇华”理念支配下的产物，不足为信。还有学者指出，以徐福如此体量的船队，在当时的航行条件下根本到不了日本。

总之，历代对于徐福归宿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做到一锤定音。或许，这就是历史和考古的魅力，使得中日交往史的溯源工作必然赍续相传，值得反复探究。由于年代久远，毫不讳言，有些史实，恐终成永难破解的历史之谜。

没有了新的线索，留下不少谜团。正在一筹莫展之时，王孙荣兄帮我查找资料，发来新购的《光绪十六年进士登科录》和《翁熹会试齿录》，如一场及时雨，顿时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光绪十六年进士登科录》中翁熹的记载比较简单，除了籍贯、乡试、会试名次，还有曾祖、祖、父的名字。《翁熹会试齿录》就非常详细了，登有本人姓名、字号、排行、出生年月、籍贯，还有上自始祖，下至子女，旁及同族尊长、兄弟侄辈等本族谱系及师承传授。择其要抄录如下：

“翁熹，字又鲁，号亦衡，行二，咸丰甲寅年（1854年）七月初十日吉时生，杭州府钱塘县学附生，民籍，拣选知县。

……

二十一世祖讳德良，一名骥，大德二年由乡贡生授衢州路学录。

二十二世祖讳传心，字君授，元延祐甲寅解元。试于春官，直言被黜，退舍湖山，世称授道先生，有诗文集传世。

……

二十七世祖讳口，行昂二。

……

高高祖讳士英，字子俊。

高祖讳廷珪，字端玉，庠生。

曾祖讳正，字名维雄，字建威，一曾祖彦，郡庠生。

祖讳济，字以和，号西村。由慈溪迁杭，著有《本草考正》，赠文林郎。

考讳机，原名丁士，字次衡，号云岩。钱邑附贡生，屡应乡荐，丙午堂备。著有《行素居文存》《医学心得》，例赠文林郎。

胞兄杰，字自豪，九岁毕全经，有神童誉。早世。

胞姊三，胞妹一。

妻穆氏，同邑从九品伟兰芬公次女，庠生名鸿钧胞姊。

女，长，殇；次，殇；三，幼；四，幼。

向居杭州武林门外仓基，现寓霞湾巷内。

将《翁熹会试齿录》与《翁氏家乘》对照，二十一世祖翁德良有四子，二子为解元翁传心，四子为翁熹。翁熹为翁传心之后，而周家团支派则为翁熹之后，翁熹并不是出自周家团支派。可惜《翁氏家乘》鹤皋支派最后，仅在子嗣名字中出现了周家团始迁祖翁岳四和翁传心一脉的翁岳二。翁岳四之后有咸丰九年（1859年）纂修的周家团支谱，而翁昂二之后是一片空白，至今未见翁皋支派的续谱，所以在查找翁熹高祖翁士英、高祖翁廷珪、曾祖翁正中、祖父翁济、父亲翁机及齿录记载的叔伯堂兄弟名字时没有一点踪影。

孙荣兄说鸣鹤翁家岙也有进士门头，那翁熹祖籍应该可以确定是鸣鹤翁家岙无疑了。可周家段的进士门头又是怎么回事？大概是翁熹中进士后，作为同宗的周家团翁氏族人也想建牌坊、挂匾额、立旗杆，以此光耀门庭，这也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做法。可周家团翁家未建宗祠，于是牌坊、匾额等都设在了祖堂思本堂，因有进士匾额，后人将思本堂称之谓为进士门头，误以为此处即是进士翁熹的宅第。

海地旧事

大塘河的开掘

郑 陆

大塘河，绵延百里，至今已流淌四百六十多年，我们尊称它为“母亲河”。道光《浒山志》引当时人言：“尚书沈休复（沈应文）曰：浒山在东，各于田下浚新河益深，畜陂泽……浒山而西，旱则可互灌，潦则可泄水。若木棉、豆、麦，其利倍于嘉谷，而水泉似可少缓。因地制宜，规划已尽，非复曩时比矣！”

又：“岑原道曰：自梅川以东，其间四、五里内，可为田，患在水泉寡不救。今塘北（指大古塘——引者注）南田，遇旱，即夜穴（掘洞）塘，引海沟水灌之。诚令缺（决，开挖）古塘，张陡壑（深沟），南北通水互灌，可以兼利，是塘北亦有水泉也。……并取诸海地修御潮塘，令高宽。于浦口多张水门，春雨水溢，决使入海，秋冬筑之，以障潮汐。如此则塘北之地渐为沃壤，亩可万计。亩收一钟，则北乡民食，可足矣！”这是大塘河给后世带来灌溉、排涝的水利。

大塘河，原作为抗倭的军事防备工事，于1555年开掘，当时叫“新河”。

“新河，在古塘下。嘉靖三十四年，倭舟泊海涯，北乡之民首受杀掠之祸。邑令李伯生请于古塘下穿河一道以备倭，东自观海，西连临山，相距百余里，阔二丈，深一丈许，路口置立栅门，乡兵巡逻守禦……既足以备一旦之急，而平时亦有溉田决水转输之利。”（《肇城志·浙江》）。出于军事目的的大塘河，在和平时时期，发挥了水利灌溉运输等效用。

当时，大古塘南东西流向的河流，大的只有东横河。余姚县东北二十五里，引钱溪湖之水，合县境东北诸溪河，北至观海卫，西过石堰，南注姚江。又一条是西横河，在姚北西三十里，引牟山湖之水，西经上虞县，北至临山卫，至海塘（《读史方輿记要》卷九十二）。大古塘北的滩涂和草荡都是用来刮卤煎盐的，自然形成又经改造有多条灶与灶之间的“灶江”，煎盐的灶甲与灶甲之间的小河沟。灶江和甲与甲之间的沟洫大都是南北向的通道口。大塘河开挖成后，把南北纵向的灶江横贯连通了起来。后来筑的海塘大都平行有一条塘河，形成了纵横连通的网格化水系。